

学术交流

XUE SHU JIAO LIU

ACADEMIC EXCHANGE

-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最彻底的人道主义（黄小寒）
- 心性学与现代性的纠结及出路（樊志辉等）
- 规范、制度、机制：村规民约与社会治安维护（高其才）
- 张惠言“意内言外”说新论（唐可）
- 北魏孝文帝朝内庭争斗与政局变迁考略（苗霖霖等）



2017
总第278期

5

中东欧思想文化研究

· 中东欧理论家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专题 ·

编者按:

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类困境和社会变革来重新审视马克思学说的当代价值和历史地位,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深受马克思思想影响的中东欧理论家的共同特征和重要主题。无论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社会主义改革的探索中“回到马克思”和复兴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努力,还是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等中东欧思想家在全球经济危机中重新思考马克思学说的价值,或是捷克学术界在经历了转型阵痛期后重新来系统地整理、翻译和出版科西克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并重新思考东欧的马克思主义,都包含着丰富的思想理论内涵,对于我们全面把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及中东欧思想理论的演进,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阐发马克思学说的当代价值,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个东欧知识分子眼中的马克思

[匈]亚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

杜红艳 译

(黑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080)

[摘 要]我最初是因为加入了共产主义阵营而开始阅读马克思著作,其提供的解释世界的一般工具和马克思对解放事业的热情都吸引了我。斯大林去世后,由于共产主义信念的道德基础破碎了,我走向对马克思思想的批判。同时,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波兰团结工会运动这一系列事件对我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使我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制度的拥护者变为批判者。但在苏东社会主义解体后,我认为马克思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值得关注,他的很多经济思想仍有助于理解当代世界。我不是任何主义者,包括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确实对我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东欧知识分子;科尔奈;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B5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7)05-0005-09

目前,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显现,马克思又重新流行了起来。马克思在政治家和新闻记者中再次时髦起来,而且马克思的预言可以被引用来支持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可怕场景。《资本论》再次成为畅销书。对马克思的兴趣突然再现^[1],对马克思思想的评价成了一个热门话题。

[收稿日期]2017-04-16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黑龙江大学专项资金项目“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现实意义研究”(HDRC201610);黑龙江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UNPYSCT-2016022)

[作者简介]亚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 1928-),男,匈牙利人,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博士,从事经济体制等研究。本文据其2008年12月6日在日本横滨神奈川大学关于马克思的会议上的演讲稿改编,系由布莱恩·麦克林(Brian McLean)从德文译为英文,见:Kornai János. Marx Through the Eyes of an East European Intellectual[J]. Social Research, 2009, 76(3): 965-986。兹着眼于了解一个东欧知识分子如何看待马克思,选择性地译发文中对马克思思想进行研究的部分,摘要、关键词、作者简介为译者加。

[译者简介]杜红艳(1983-),女,黑龙江林甸人,副教授,博士,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恐怕对于卡尔·马克思来说,所有可以说的东西都已经出版了。无数论文和研究报告,以及专著图书,都已经出版,涵盖了从疯狂的赞赏到客观的分析再到愤怒的厌恶之全部范围。对于这个伟人,我能增加的是我研究马克思著作的具体优势。我是一个匈牙利人,一个东欧人,出生在1928年,随着二战的结束而进入成年。我思想中最深刻的印象都是由伟大历史事件给予的:家乡的战争、大屠杀、从纳粹体制下解放出来,共产党及其社会制度来临,1956年匈牙利革命(及其失败,还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复位),20世纪60年代市场社会主义实验和带有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及其失败,社会主义制度的倒塌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恢复,民主取代专制,以及今天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只有我们这些生活在东欧而且现在已经七八十岁的老人能够说说我们自己的经历——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多次、反复地、一次又一次地经历制度的变化和大转型或者至少是政治体制的激烈变化——意味着什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比,以及这两种制度的特点,大转型——这些都是马克思最感兴趣也最想要理解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而我们,不是仅在理智上关注它们——我们还经历了那些转变。不是一些专业的分析能力,而是这些经历使我有资格对这个伟大的、杰出的马克思作一些具体分析。^①

这篇文章充满个人的语气。我将要揭示的不是东欧知识分子的集体观点,而是我的个人故事。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独特的、不同的。但是,我将在许多方面证明我自己的故事具有典型性。我生活中的许多时期,即便不是全部时期,是可以代表他人生活中的类似阶段的。当我的自传《思想的力量》^②出版时,许多人跟我联系,对我说,读了我个人历史的一个或另一个时期,他们感觉在讲他们自己的故事。当我把我的思想与马克思关联起来的时候,我希望在我个体生命的各个阶段上(以及在深深地影响了我的生活的历史中)同样的情形会适用于马克思。

我只能从马克思著作的巨大宝库中选择很小一部分思想。需要进行一种彻底的研究来表达我对这些思想的评论,但这里我的空间有限,所以我不能提供详细的分析性观点。我希望这种体裁——对我与马克思著作关系的主观故事的描述——能让我讨论全部的主题,即使以非常快的速度。

一、是什么将我引向了马克思

当我还是个毛孩子时,我就沉迷于书本。我疯狂地读书——不只是世界性的经典名著,而且包括哲学和历史作品——尽管在1945年之前我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任何作品。在一个富裕的家庭,或者在一所教育上层中产阶级子弟的学校,没有人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交到我手里。然而,一两年后,我就可以宣称自己是一个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是什么带来了这么迅速的变化并且如此强烈地将我引向了马克思呢?

我敏感的青春时期与歧视犹太人的法律以及对犹太人的人格迫害经历相吻合:处于躲藏、逃跑和恐惧中。这种状态在布达佩斯被围后不久结束,结果明朗了:我的父亲被驱逐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并在那里被杀害,哥哥也没有从强制劳动中返回。从我的研究中我了解足够多的历史,我的个人经验使我知道希特勒政权及其匈牙利共犯把国家推向了战争和种族灭绝。多个新党派建立起来,同时我迅速变成共产党的一个支持者。使我如此的第一个思想原因,是我认识到共产党是这样—一个政党,它反对霍尔蒂·米

^① 我想挑出下面这些近著和当代文献:埃尔斯特(Elster J. Making Sense of Marx[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福莱(Foley D. Understanding Capital: Marx's Economic Theory[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科拉科夫斯基(Kolakowski,1978)、曼德尔(Mandel E. Marx, Karl Heinrich(1818—1883)[K]//Durlauf Steven N, Blume Lawrence E.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Vol 5). New York:Macmillan,2008)、罗默(文后参考文献[4],以及Roemer E J. Foundations of Analytical Marxism[M].Brookfield VT:Elgar,1994)和塔比特(Tabbit F. A Brief History, Scope, and Peculiarities of "Analytical Marxism"[J].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2006,38(4))。西方大学里使用的理论史教科书——或者至少其中在过去十年里出现者——提到马克思的著作,但通常不去分析或者深入评价它们。例如巴克豪斯(Backhouse,2002)、维基(Vaggi,2006)及格罗奈伟根(Groenewegen,2006)的书。

^② 我的自传最初于2005年用匈牙利文出版。接着出了日文和英文版(Kornai J. By Force of Thought: Irregular Memoirs of an Intellectual Journey[M].Cambridge:MIT Press,2007),然后是俄、波兰、越南文版。2009年出中文版。

克洛什(Horthy Miklós)数十年的统治,冒着迫害的危险——霍尔蒂政权与希特勒结盟且后来引进了纳粹统治。我的立场与此一致。所以我加入了共产党——尽管吸引力并非社会主义的社会转变计划,那时我对此计划知之甚少,而且那个时候的共产党在很多时候都不怎么谈论它。

当我开始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青年运动的会议和讲座的时候,我也开始阅读党的小册子。党的意识形态使我感到很投缘,并且社会主义思想令人信服。

在国家从德国的占领下解放出来后不到一年,我被引向了马克思。我第一次读《资本论》(那时读的是德文版,因为该书还没有翻译成匈牙利文)是在18岁,而且和我最亲密的朋友一起逐字逐句地仔细阅读,彻底地研究,并写下了详细的注释。

这里我稍停片刻,注意一下时间顺序。尽管我是一个年轻的书呆子,但把我推向马克思的第一动力并非理性经验。我首先出现了加入共产党活动的政治取向,然后开始受马克思著作的影响。我并非始于仔细审阅考察各种理论思潮、经济和哲学流派,然后最终选择了马克思;而是始于在各种时政运动、政党和意识形态中选择一个党——是共产党将马克思的著作放在了我的课桌上。

我可以列举《资本论》那时对我产生强烈影响的一长串特征,但请允许我只挑几个来谈谈。

当我继续通过严谨的著作逻辑进行阅读时,我渐渐为《资本论》的思维和论证的精炼性以及概念的精确性着迷。我早期曾经形成了一个特征,我的家人和朋友讽刺性地称之为我的“秩序狂热症”。我发现,在写作、讲座甚至自由讨论中,我都很难忍受杂乱无章和冒险主义。马克思以其概念纯粹的、容易理解的结构及明确性直接赢得了我的赞同。直到很久以后,我偶然看到了一些将马克思的伟大的智识结构翻译成数学语言的著作。匈牙利经济学家布洛迪^[2]和日本经济学家森岛通夫^[3]运用输入/输出模式表达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美国经济学家罗默^[4]运用主流微观经济学的标准工具改述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严谨的数学语言的运用使得他们的模型建构变得更容易,因为原初素材(例如再生产理论)最初被马克思按照一种逻辑的顺序以精确的定义表达了出来。

我也对其他的東西印象深刻,否则不会在第一次阅读中或者在之后的阅读中,我就阅读并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作家的著作。我的印象是马克思主义者获得了一把万能钥匙。他们拥有一个具有普遍说服力的分析工具和概念框架。凡是历史事件、经济问题,或者被当作阶段性表现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都有一个执行分析任务的工具。这给予了马克思主义者一种优越性:可能某甲或者某乙更为细致地了解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彻底地研究了多年资本主义,但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我是,所以我能够比他更理解这个历史阶段;可能某批评家具有可靠的文学品味而且对戏剧更为在行,但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我是,所以我比他更能够辨别出戏剧的真正优缺点。

年轻的知识分子渴望某种对世界的一般解释。一些人在对上帝的信仰中,或许在某些宗教信条中发现了这样一种全面的解释。经过现代训练的一些经济学家或者其他社会科学家在“理性选择”理论中寻求对全部人类努力和社会事件进行一种解释。就我而言,这种对一种普遍解释工具的强烈需求被马克思主义满足了。我所考虑的不是无足挂齿的粗浅涉猎者,而是像哲学家卢卡奇、经济学家沃尔高(Jenő Varga)这样的匈牙利同胞,这两位在他们的研究领域里都是举世闻名的。我感到,我对马克思和他的伟大追随者知道得越彻底,就越能牢固地抓到一切问题的核心。

我再说说第三个吸引力,尽管事实上它是跟前两个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这就是马克思那种致力于被压迫者和被践踏者的事业的热情。1944年,战争的最后一年,命运将我从中等家庭的舒适中剥离出来。我在一家工厂做了几个月搬运工。那里的工人以友好的方式接纳了我这个骨瘦如柴但勤勉的年轻人。我走进了他们的家,不禁将我过去宽敞高雅的房间与他们狭窄的住处相比较,将家里丰富的食物与他们不足的给养相比较。我产生了一种团结精神并一直保持着。《资本论》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书,这也是因为它将冷漠的经济分析与温暖的人类情感和对剥削的憎恨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了一起。

二、是什么再次唤醒了

现在我将适时地从战后那几年中走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从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教义中吸收了越来越多的东西——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及随后数年的情况,构成了共产党及其统治的生命

转折点。这也同时造成了我思想的转折点。

跟上次一样,转变不是发生在思想层面,尽管或许本可因阅读那些批判马克思学说的著作而产生这种转变。使我确信马克思在基本问题上误的不是任何书刊中已经出版的批判。我被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打败了——不是我所建立的牢固至今的思想体系,而是我的信念。我遇到一位年长的同僚,一个老共产党员,他被逮捕了,并遭受拷打,尽管他根本没有犯罪。原先我不知道秘密的政治警察会通过严刑拷打获取虚假供述,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按照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指示。这个认识使得构成我信念的道德基础崩溃了。如果这能够以共产主义的名义进行,周围一定会有一些腐败的东西。

回想起来,在转变发生之前我已经形成了一种精神防御机制。我全心全意地相信共产主义思想,不仅是头脑中相信,而且我已经筑起了篱笆来阻止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学说的思想进入我的头脑。一本反对马克思的著作出现在我面前也毫无用处,因为我将毫不理会这样的著作,我认为书中包含着敌人的偏见。我感觉自己可以免于去评价我可以接受的与他人相反的思想。顺便说一句,这种精神状态不局限于心悦诚服的共产党员。在所有那些带有狂热信念的人当中也存在这种精神状态。^①一个宗教法庭检察官或法官,一个发出人体炸弹的恐怖组织的负责人员,一位传教士,一个原教旨主义者,或者一个心悦诚服的有魅力的政治家,都可能是一个有教养而且具有理智能力的聪明人,然而对于别人反对其所持狂热信仰的观点也极其不屑一顾。当存在于他们自身内部的信念的精神支柱仍旧很强烈的时候,冷静的、理性的观点不能令这种类型的人信服。

但是突然间,随着支撑我信念的道德基础的破碎,我思想的闸门打开了,批判的思想涌进来。这里让我再稍停片刻,指出我的故事的经验教训。又一次,从狭义的角度看,某些东西已经先于思想的转折点产生了。然而这次,先前的情形在一种道德的而非政治的层面上发生了。闸门再一次打开,我勇敢地面对争论。以我现在认可的批判,我重新逐条审视了自己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方法。新思想得以进入,而且,我突然也在一种思想的层面上变得具有批判性。我开始解决以前我回避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仍旧处于我思考的边缘位置。

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报道经济问题的新闻工作者。我经常碰到一些荒谬的事情:浪费、无纪律、品质低劣以及匮乏的无数种表现。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出发,我没有得到有助于分析这些问题的帮助。对于明显的经济问题不作必要的分析,这是什么经济学?问题不是这种经济学给出了错误的答案,而是它根本没有提出这些问题。我开始认真研究一些与马克思的理论相反的人的理论,并且发现我面前敞开着—个新世界。这些人或好或坏地涉及了我周围的经济学的没有明确解决的问题。尽管他们审视的一些问题只是按照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式提出来的,他们还是有规律地考察了普遍性的问题(比如效率,或者生产和需求的方面,供给与需求的关系),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的重要性不亚于它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重要性。

对于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没有忽视的理论主张,我也产生了疑虑,但是在彻底地研究后提出的。举一个例子:马克思经常重复他对于财富积累的发现。在《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这一章,他说道:“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5]645}^②马克思的追随者——且这与上述内容的含义不冲突——总是指出工人阶级的相对的和绝对的贫困化。与此相反,出国旅行获取的表面印象和所有可靠统计资料都显示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靠劳力为生者的平均生活水平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上升到一种非常稳固的程度。(当然,这不是说贫困已经消失。)这绝不是很容易清理的小误解。对无产阶级贫困的预测对于得出马克思论证的最终结论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要是贫困果真持续增长并扩大到越来越多的大众,亿万人的愤怒很久以前就会把资本主义一扫而光。

经过几十年的学习过程,我不断地改进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教条批判的知识体系。越来越多的马克

^① 伟大的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奥兹(Amos Oz)在其杰作《如何治愈盲信者》中得出类似的结论。见:Oz A. How to Cure a Fanatic.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743-744页。中译者注。

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必不可少的命题对于我来说变得不可接受。最终我达到了一点,即根据价格、工资、消费和利润的真正运动的理论,我能够拒斥劳动价值论,随着研究的深入,价格、工资、消费和利润的理论可以解释增长程度。^①

三、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理智责任

让我们直接回到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前的那年。20世纪50年代中期左右,我从一个狂热的、天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转变为一个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强烈而且不断加强的批判者。

我的同时代人并没有全部经历过同样速度或同样形式的理智转变。一些人同时拒绝一切陈旧的方法;一些人则是一步一步地拒绝,以免每个意识形态碎片都消失无踪。一些人很早就开始变革他们的思想;而另一些人则迟了几十年才开始变革思想。但是基本上,伟大的历史戏剧共同记载了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的理性转变以及该群体所有成员的理性转变。^②对于那些曾经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而起步的人来说,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就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及其被暴力镇压。另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则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凋零。然后,发生了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政府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和军事管制。甚至那些试图保护他们的世界观的每一片碎片的人都经历了从未有过的更强烈的疑虑。折磨我们所有人的是20世纪的一个基本问题:被称为“现存社会主义”的那种社会制度真正是什么样的?它不可避免地蕴含了所有我们经受过的痛苦吗?从饥饿经由技术落后到长期匮乏,从拒绝思想自由到严重的政治恐怖行动到古拉格群岛!或者所有这些痛苦的经历是由刑法上的有害措施引起的而与马克思、马克思的理论或者他提议的行动计划无关吗?

许多人在思想中构想过这样的故事,就是如果同一个马克思不生活在他自己的时代而是生活在20世纪,例如生活在20世纪的布达佩斯,那么马克思会表现如何。他大概将会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而起步,但是他的反抗精神会很快将他置于对现存的共产主义体制的反抗之中。他可能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被送进了集中营;要是他得以幸存下来,他将会参加1956年事件前的筹备性的理性辩论。他可能会在革命分子中间,而且如果他在随后的逮捕浪潮中逃脱了的话,他将会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出版他对于苏联类型经济的尖刻的批判。这是一条令人兴奋的思想线索,为的是在我们的头脑中为马克思辩护,为他这个人以及他典型的批判特征,并尊重他的勇气和他为道义的献身。但是这回避了我们早些时候提出的真正相关的问题: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观点同历史现实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我将首次尝试简短地回答这个问题:马克思的计划的的确被社会主义制度付诸实践(并非一些美好的乌托邦,而是实际存在的、我所经受过的东西)。

我知道一些人听到尖锐的观点会感到不安,甚至一些人现在读到这些依然会不安。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正确的观点,是为历史事实所支撑的,即1917年之后在共产主义地区产生的东西以及直到1989年之前一直存在的东西基本上是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终将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预言的实现。

马克思思想线索的核心在于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是私有制。废除资本主义意味着将生产方式置于公有制之中。当私有制居于主导地位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商品的交换和生产力的分配会由市场来调节。市场是一架劣质的调节器,不透明,而且无计划。公有制将会允许对生产力进行分配,并最终使人类劳动变得透明和有计划。

^① 顺便说一下,持这种观点的,不只是那些从未受马克思影响的人,也包括那些所谓的“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主要代表,即使他们拥护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和哲学的大多数成分。见:Tabbit F. A Brief History, Scope, and Peculiarities of “Analytical Marxism” [J].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06, 38(4): 598-599.

^② 与马克思思想的争斗和对马克思主义的逐渐超越,可以在东欧社会主义科学家的作品中找到。我只提两部值得注意而且影响巨大的作品:布鲁斯1961年最先用波兰文出版的著作(Brus W. The General Problems of the Functioning of the Socialist Economy. New York: Routledge, 1972),以及本斯和吉什的研究成果(Bence G, Kis J. Towards an Eastern European Marxism. London: Allison and Busby, 1978)。后者的地下出版物最初在匈牙利非法地流通,而后在迁移到巴黎的匈牙利移民杂志上以笔名(Marc Rakovski)出版。

让我引用几段引文来回到我的论点,这些引文都是马克思自己的思想(而不是那些我们或许看低了或者误解了的马克思思想追随者的观点)。第一段来自《资本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5]⁷⁶³①在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内战》中可以找到他另一句重要的话,即“无时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动荡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生产难以逃脱的劫难”,在同一部分中可以找到经常被提到的一般计划,即“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6]②

现在让我们将那些理论主张跟在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产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作一下比较。现实制度的两个特征恰恰是马克思预计和规定的:

1.这种现实制度非常接近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尽管私有制的残余依旧无处不在,展现出一种贫乏的、有限的形式),主要以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存在的公有制取而代之居于主导地位。

2.这种现实制度非常接近市场调节的消失(尽管在黑色和灰色经济中仍旧存在残余的市场调节),同时,中央计划、官僚协调和计划经济取而代之居于主导地位。

这里我并非随意列举社会主义体制的两个次要方面。我谈到的是这一经济秩序的两个基本特征。^③

如果我从思路狭窄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一个习惯性的回击就是:斯大林主义政权只是把马克思的名字用作一种令人误解的象征、一种守护神,而实际上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现在我只是试图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来驳斥那种观点。那些政权有充足的理由援引马克思,因为他们执行着马克思提出的巨大历史任务。

马克思学说的坚定捍卫者不想面对这样一种直截了当的陈述,即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及其在其他国家的追随者实现了马克思的变革计划。我就有不止一次这样的经历。我在一些美国大学遇到过一些聪明而且有趣的学生,他们自称为“激进的经济学家”。他们满腔热情地阅读和研究了他们认为在政治上可以接受的著作。他们也准备彻底地认知和研究主流经济学。但是他们不屑去研究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经济。对此他们毫无兴趣,或许更恰当地说,他们排斥和厌恶共产主义经济,把共产主义经济看作跟他们所尊重和接受的马克思的思想完全无关的无关紧要的东西。在我看来,他们正像鸵鸟一样,将他们的脑袋插进沙子里面。

我所发现的这种例子并不限于年轻的学生。甚至当我为了准备这篇文章而以思维开放、训练有素的“马克思理论重释者”的身份阅读文献的时候,我吃惊地发现,甚至那些最好的研究也不愿去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规划与苏联、改革前的中国或者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进行比较。像列宁或斯大林这样的名字根本不被提及。

在我看来,理智的和政治的诚实需要我们自觉地面对问题:马克思的思想与已经实现了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什么共同之处?马克思与列宁、斯大林有什么共同之处?我试图直接回答自己的问题。这个答案可以驳斥,但问题本身的相关性很难否认。

一种不承认个体的创造性并将市场调节排除在外的经济,依赖于上级的行政管制,依赖于纪律和指令必须自上而下地实行的一种机制。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压抑不能起作用。增强这一压抑机制,这种制度迟早会倒塌。这一点发生在苏联;而当苏联开始解体,东欧也发生了剧变。

这与马克思关于专制和民主的观点相关联。他本人可能也会害怕目睹发生在肃反委员会的酷刑室或者西伯利亚劳改营的事情。不过但凡只须在纸面上表达自己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总是蔑视虚有其表的、形式化的资产阶级立宪制、议会制和民主制,转而呼吁无产阶级专政。

我一直在重新阅读考茨基与列宁之间的著名辩论: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7]和列宁的驳论《无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874页。中译者注。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159页。中译者注。

③ 我尝试用简短的几行字来概括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这一思想在我的著作《社会主义制度》中有详细论述,见:Kornai J. The Socialist Syst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8]。考茨基在某种程度上以客观的语气写作。他强烈支持社会主义思想，但也坚持议会民主。他担心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借口来压制大多数人的意志，滥用权力，丢下少数人。列宁尖刻地嘲笑和轻蔑了他的对手，反对考茨基的一切观点。然而在我们今天看来考茨基担忧的一切都是合乎情理的。是考茨基，而不是列宁，对此的观点是正确的——有一个重大的例外情况：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的解释。是列宁而非考茨基创造了有说服力的观点，并引用两位预言家的思想来支持了他的论点。列宁回忆了马克思非常著名的话语：“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9]^①。他引用恩格斯的话：“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10]^②并引用恩格斯的另一句话来指着考茨基的鼻子说：“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11]^③

考茨基无法从马克思那里找到引文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上，他也引用了马克思，因此不得不做出了这样痛苦的评论：“很不幸马克思不愿去更为具体地说明他认为这种专政是什么”^[7]⁴³。无论在考茨基那里，还是在客观的同情马克思的当代学者那里，我都没有找到一段引文能够说明马克思这位杰出的政治分析家曾经全面地分析过政府、国家或者压迫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审视民主制度与人类权利之间的关系，或者揭示出专政的危险。马克思忽略了问题本身，即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制度保护的全部领域。这种鄙视在列宁和他的忠实追随者那里变得根深蒂固。

有一种论述认为，民主不过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由于被另一种专政的革命手段替代了。这种论述模糊了民主与专政之间的巨大差别。直到希特勒出现之后，西方共产主义者才认识到，“形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议会制、法治国家、合法性并非虚假的，而是拥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因为它们在任何时候都给希望表达意见的人提供了制度保护，给政府的批判提供了制度保护，给社会的激进转变提供了制度保护，包括给那些像马克思在他的时代那样专爱唱反调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制度保护。

本部分的标题中的“责任”一词很明显不是在一种罪恶的意义上运用。宣布一种错误的观点本身不是犯罪。“责任”问题甚至不是在一种伦理的意义上产生的。马克思没有因为提倡消灭私有制和市场而打破伦理的规则，却也没有认识到议会民主制和法律规则在维护人的权利的过程中的价值。我只是在谈论理性的职责。如果我提出一种促进人的社会实践的思想，我就会具有与那些直接进行实践的人同样的职责。我的话语越有影响力，我的职责就越大。而且，没有人具有比马克思更大的影响，没有人比马克思的思想和实践计划的影响更大。

四、马克思学说的哪方面继续存在影响

社会主义制度一解体，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知识分子圈子中就流行了这样一种普遍的看法，即马克思的思想彻底倒塌了。看！他们被历史驳倒了！不止一次，我看到了自命不凡的著作或者自大的评论，他们认为马克思现在正在终止、过时，而且不再会被关注。

然而，时代总是在不断变化。正如我在开场时谈到的，今天，在经济危机的混乱时代，引证马克思再次变得流行。

极端地关注和完全不关注都是不公正的。马克思的著作已经不可磨灭地将他的名字写在了政治和思想的历史中，而且他的很多思想仍旧立得住，并有助于理解当代的世界。稍后我会回过头来谈这点，但先让我稍稍说说马克思的最新复兴。马克思当然不断地预言了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以及资本主义怎样会引发致命的危机并最终倒塌。甚至一些特别尊重马克思思想的学者们认识到有关资本主义最终倒塌的思想线索很难跟踪，非常高深莫测，或者说简直是错误的。^④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339-340页。中译者注。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338页。中译者注。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111页。中译者注。

④ 人们通常理解，马克思的有关思想意味着下滑的利润率是一个趋势，这种趋势达到了使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无能为力程度。大多数批判引用历史事实来反对理论的原理和这种趋势。比如我，就是赞同这种批判的。

我不沉溺于预言；我所有的经验教会我，世界的重大历史转变往往是出乎意料地发生的。我不知道社会组织未来会坚持什么。我所能说的，是我还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倒塌的迫近，更不用说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预言的实现了。在我看来，资本主义的根基太坚固了。问题无论如何不会取决于预言家的决斗，而是取决于未来的事件。现在我能说的全部内容，就是资本主义仍然活着，尽管它受到间歇性痉挛折磨。

日常压力来自政治家和评论家关于西方世界的“苏联化”的传说的评论。还有什么能够解释一些政府不救助自由而是相反要求所有权这一事实呢？（让我加上这样一句，变成国家财产，政府以后可能会再度私有化，除非一些共产党在美国或者英国获得权力，专心致志于不惜一切代价应用苏联模式。）那些“苏联化”的胡说和引入社会主义的说法正在暴露这些人的无知，不仅是对马克思的无知，而且是对苏联历史和社会主义真正特点的无知。

然而，值得强调的是《资本论》第一卷^[5]和第三卷^[12]当中的一些卓越观点，即有关信贷的周期性过度膨胀及这些影响引起的危机的观点。马克思可能是第一人或者最早的人之一，注意到了信用的膨胀（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造成了生产过剩——即，造成了超过需求的生产和过度生产的能力。这种加速膨胀持续进行，直到贷款链突然断裂。^①

一些理论经济学家和实践金融家在过去的十到二十年中认识到信用的不负责任的膨胀、错误的风险估计以及对信用制度的恰当管理之缺乏等现象当中的危险，甚或提出了防范建议，但是没人听。这些警惕性的警告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者群体或资本主义的激进反对者群体，而是来自那些害怕信用危机的资本主义信奉者，来自现存信用实践的批判者——换句话说，来自制度的改良者（reformers）。

现在让我回到我文章的主体参照系，说一说对我而言马克思思想中最有益和最直接的东西是什么。他的天才使我们陷入观念和分析工具的困境中。在这篇简短的文章中我已经用他的几个基本思想指出了问题，并且指出我不想接受这些思想。但是如果我可以继续代表我自己讲话，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思维来说，有许多我仍然能够接受并试图应用的重要贡献。我将只举几个例子。

当提到“创造性的破坏”的时候，大多数人会想到熊彼特（Schumpeter）：企业家设计了新产品，引进了新技术，传播了新组织形式，进入了新市场。从熊彼特那里，我们继续看到，熊彼特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摧毁了旧世界，并以其自己的世界和生产方法代替了旧世界，并将它们应用到了新的社会中。但是老实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早就描述了这个过程以及资本主义的创造力和毁灭力，在《共产党宣言》^[13]的令人陶醉的第一段话中就描述了。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资本主义在组织技术革新和进步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马克思之前和之后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注意力都集中在平衡状态上，尤其是当供需平衡时市场达到平衡的特殊情况。这种特殊的状态后来变成著名的瓦尔拉斯均衡理论^②。除了马克思，还有马尔萨斯（Malthus）作为先驱研究了与市场平衡不同的状态——不仅围绕瓦尔拉斯市场均衡随机变动，而且与瓦尔拉斯市场均衡有偏差。在这方面，马克思尤其关注劳动力市场，在劳动力市场上，供给持久稳固（persistently），不是暂时高于需求。马克思对他自己所称的“相对人口过剩”现象的审视，驱使他去探索劳动力的经济学膨胀，而不是统计学膨胀。现在，劳动力持久稳固地超额供给，这同一种现象在劳动经济中被认为是失业均衡^[14]。很少有人记得马克思是这个观点的开山鼻祖。就我而言，我必须说，我从马克思那里主要学到了，从市场平衡出发来研究和解释持久性的偏离是何等重要的事。^③

① 马克思从未集中总结其关于重复性危机的思想。或许，应该一提的主要是《资本论》第三卷第30章，那里简要地出现了有关危机的思想。见：Mandel E. Marx, Karl Heinrich (1818—1883) [K] // Durlauf Steven N, Blume Lawrence E.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Vol 5). New York: Macmillan, 2008.

② 瓦尔拉斯均衡（Walrasian equilibrium）也称一般均衡理论，是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Walras, 1834—1910）1874年在《纯粹经济学要义》中创立的，指整个市场上过度需求与过剩供给的总额必定相等的情况。——中译者注

③ 我研究（见 Kornai J. Economics of Shortage [M].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80）的中心现象是社会主义经济中明显的商品和劳动力的长期短缺。与之正好相反的镜像，是马克思和凯恩斯所描述的持续过剩思想。

对于“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如何被创造出来并引发了学术思考的确切历史,我不熟悉。但是我不认为这一点我说错了,即大部分政治家、评论员和社会科学家长期以来将“资本主义”概念同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联系在一起,随之将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跟在马克思的时代尚处于预测和渴望中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世界对立起来。马克思不是将社会主义制度构想为一种乌托邦,而是构想为一种一定会出现的历史现实。这种概念框架与马克思的连续性的生产方式理论紧密相关。

我仍旧受马克思思想结构的重要部分所强烈影响。在我的一本著作中,我创造了“制度范式”这个术语,其所指不是脱离社会的部分或与社会相关的部分,即政治领域、文化、知识领域或经济,而是集中在由部分组成的整体。因此,它将注意力集中于各个部分怎样彼此相关,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制度不是以一种静态的方式被描述,而是以动态的方式被描述的,因为它是在历史中展开的。马克思是制度范式的伟大先驱和无与伦比的实践者。他同时身兼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等角色。在他那个时代没有人运用“跨学科”这个术语,但他树立了如何突破狭窄的学科界限并以一个综合的社会科学家身份开展研究工作的范例。

人们有时候问我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的答案是一种明确的否定。^①另一些人想要将我归于奥地利学派,或者将我称为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一个新古典主义者、一个新自由主义者等等。每次我都摇头。我不是任何“主义”的一个无条件的追随者。尽管其他人可能试图这样做,但我不允许自己被分类。我更愿意承认我思想的成分正在混合——用恩格斯的带有讽刺性的语言说——成一碗折中的乞丐的混杂汤;如果我对自己不那么恶言相向,我会更倾向于说,我探索将各个流派的思想结合起来。如果非得指明那些对我影响巨大的人,我就要提到熊彼特、凯恩斯和哈耶克,但是,在列举这些人的过程中,我会首先提到卡尔·马克思的名字。

[参 考 文 献]

- [1] Collins P. Karl Marx: Did He Get It All Right? [EB/OL].(2008-10-21). <https://www.thetimes.co.uk/article/karl-marx-did-he-get-it-all-right-h70pl9tcdz5>.
- [2] Bródy András. Proportions, Prices and Planning: A Mathematical Restatement of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M].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70.
- [3] Morishima M. Marx's Economics: A Dual Theory of Value and Growth[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 [4] Roemer E J. Analytical Marxism[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5] Marx K.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 [6] Marx K. The Civil War in France[M]//Marx K, Lenin V I.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The Paris Commun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88:61.
- [7] Kautsky K.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M].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4.
- [8] Lenin V I.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Renegade Kautsky[M].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4.
- [9] Marx K. Political Indifferentism[M]//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nd After. New York: Vintage Book, 1974:300.
- [10] Engels F. On Authority[M]. Marx-Engels Reader. New York: Norton, 1978:733.
- [11] Engels F. Introduction[M]//Marx K, Lenin V I.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The Paris Commun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88:22.
- [12] Marx K.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 [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 [13] Marx K, Engels 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M]//Marx-Engels Selected Works (Vol 1). Moscow: Progress, 1969.
- [14] Layard R, Nickell S, Jackman R. Unemployment: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the Labor Market[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8, 11.

[责任编辑:余明全]

^① 那些曾经在 1989 年之前讲授“辩证唯物主义”或者“政治经济学”课程(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教条课程或者同样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的人如今不肯接受东欧的现实。我在这方面却是另一种经历。正如我在本文开头所说的,我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出发的。但是在 1956 年 11 月,在苏联坦克闯入布达佩斯之后,作为一个政治声明,我向共产党当局宣布:注意,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使我后来在学术界生活异常艰辛,在那个学术界,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简直是强制性的。